

论西汉、新莽的宗庙与社稷

刘振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西汉，新莽，汉长安城，宗庙，社稷

摘要：汉长安城及周边分布有西汉、新莽的宗庙和社稷。西汉太上皇庙和高帝庙位于城内，惠帝至平帝庙位于各自陵墓附近，太上皇和高帝陵旁也有陵庙。新莽宗庙位于城的南郊，即第1~12号建筑遗址。关于第13、14号建筑遗址，有认为分别是西汉、新莽的社稷。近年在第14号建筑遗址范围内勘探新发现两处建筑遗址，一处在该遗址西部、内外围墙之间偏南处，另一处在该遗址西部、内外围墙之间偏北处。本文推定这南、北两处建筑遗址分别为西汉、新莽的官社、官稷。

KEYWORDS: Western Han, Xin-Mang era, Han Chang'an city, Ancestral temple, *Sheji*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ABSTRACT: Ancestral temples and *Sheji*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from the Western Han and Xin Mang periods were distributed in and around the Han capital of Chang'an. The temples of the *Taishang Huang* and Emperor Gaozu were located within the city, while those of emperors from Hui to Ping were situated near their respective mausoleums. Additional temple complexes were also constructed beside the tombs of *Taishang Huang* and Emperor Gaozu. The ancestral temple complex of the Xin Mang regime wa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Chang'an and corresponds to architectural remains numbered 1 through 12. Foundations nos. 13 and 14 have previously been identified by scholars as the *Sheji* altars of soil and grain of the Western Han and Xin Mang periods, respectively. Recent surveys in the area of foundation no. 14 uncovered two new sites: on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pace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enclosures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complex, and another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same zon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ese newly discovered features correspond to the official *She* altar of soil and *Ji* altar of grain of the Western Han and Xin Mang periods.

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伴随新发现、新材料的出现，相关研究也不断得到深化。本文拟对分布于城内、城外的宗庙与社稷加以讨论。

一、宗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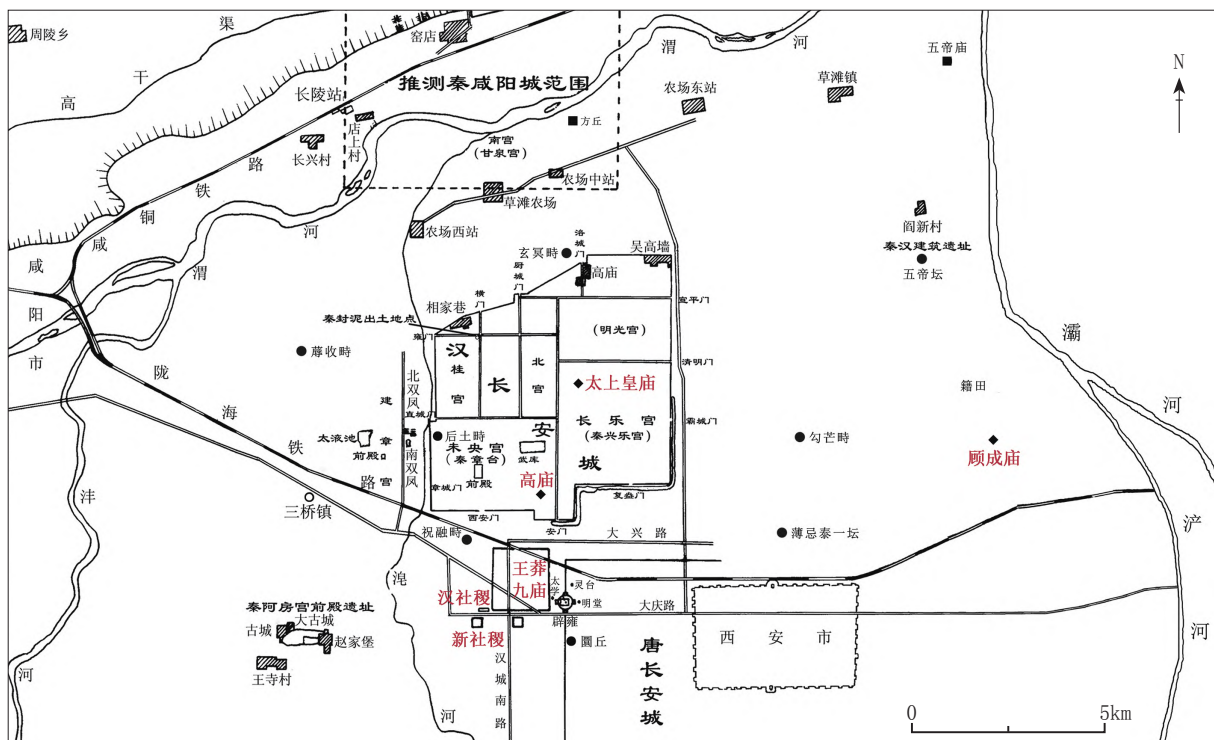
(一) 西汉宗庙

汉室宗庙最早是高祖为其父营建了太上皇庙。关于太上皇庙的位置，史汉无载，据《三辅黄图》记载，是在长安城内“香室街南，冯翊府北”^[1]。若香室街是清明门大街，则庙在清明门大街以南。我们在清明门大街以南、安

门大街以东、长乐宫西北部宫墙以北勘探到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址，推测可能是太上皇庙的旧址。太上皇庙的主体建筑外应有内、外两重围墙，外墙是便地的围墙^[2]。在内、外围墙间的西南部有冯翊府，东南部有内史府。太上皇庙还在郡国营建，开汉室宗庙在地方营建的先例（设在郡国的还有高祖、文帝、武帝庙）^[3]。

惠帝为高祖营建的高庙，在长安城中。

《汉书·叔孙通传》：“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蹕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



图一 汉长安城礼制建筑分布示意图

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4]据此记载推断，高庙当在武库以南、未央宫以东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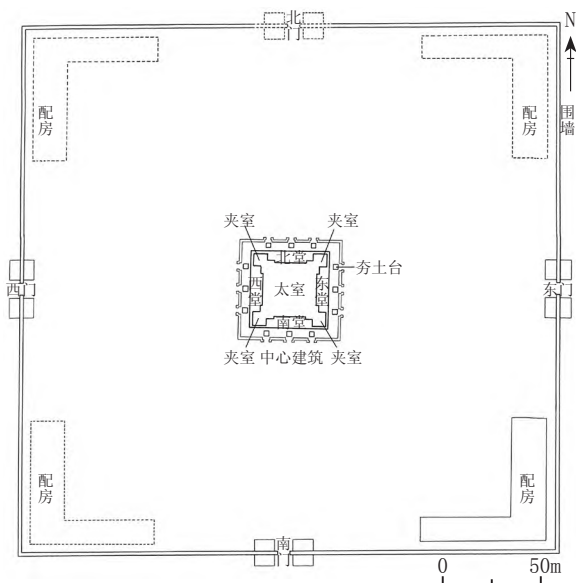
《汉书·叔孙通传》晋灼注曰：“《黄图》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寝在桂宫北。”^[5]有研究者认为“城门街”为安门大街，高庙在安门大街以东的长乐宫西南角以南区域^[6]，可备一说。我们在安门大街以西、未央宫东南角以东处勘探发现一处建筑遗址群，其外有夯土围墙，结合上述文献，这处建筑群也存在是高庙旧址的可能性。

关于惠帝庙，史汉未载其方位。《三辅黄图》记载是在“高帝庙后”^[7]，《长安志》引《关中记》：“惠帝庙在高庙之西”^[8]，陈直认为传世的“西庙”瓦当疑为惠帝庙之物^[9]。有研究者认为高庙与惠帝庙东西毗邻，都在长安城内的安门大街以东、长乐宫西南^[10]。如上所述，惠帝为避免复道从“宗庙道”上穿行，在渭北新立了一座高祖庙——原庙。文帝若将惠帝庙建在长安城内的高庙附近，定会遇到同

样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惠帝庙位于长安城内的可能性不大。惠帝庙应在渭北的陵墓附近，也可能位于高祖原庙之西^[11]。《汉书·韦贤传》：“（韦玄成）后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12]此记录或可说明通往惠帝庙的路途较远、路况不佳。

文帝在世时自作了庙（自作庙者还有景帝、武帝、宣帝）。《汉书·文帝纪》：“（四年）作顾成庙。‘东汉服虔注’庙在长安城南。”^[13]北宋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记录：“（休祥）坊内有汉顾成庙余址，庙北汉奉明园，园北汉奉明县。”^[14]唐长安城的休祥坊约在汉长安城覆盎门外大道的两侧，属于汉长安城南郊偏东部。笔者曾对顾成庙的位置做过考证，认为应在汉长安城的东郊偏南方^[15]

（图一）。近年在西安市东郊的浐河故道上发现一座木桥遗址，被认为是文献记录的“南陵桥”^[16]。《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蓼侯孔臧为太常，（元朔）三年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17]当时从文帝霸陵的寝庙游衣冠到顾成



图四 汉长安城南郊第3号建筑遗址平面图

戚称穆庙 (F4) [24]。这样排布存在的问题是庙号、庙数为9个, 但建筑却有12座。黄展岳从文献记载王莽的世系中寻找答案, 认为王莽另有3个远祖, 即古帝祖先帝啖 (F6) 和古王祖先田和 (F5)、田建 (F7), 这3个祖先都有资格立庙, 因庙数必须是常数 (9), 所以被排除在庙号之外。

黄展岳复原王莽宗庙布局, 即庙号与9座建筑遗址的对应关系如上, 将没有庙号的3个远祖对应到中排的3座建筑遗址 (图五) [25]。顾颉刚提出另一个复原方案, 将多出的3座建筑遗址设想为3个新庙, 1个是王莽自留的庙 (F6), 其他2个是预留给子孙有功德而为祖、宗者 (F5、F7), 也是对应到中排的3座建筑遗址 [26]。

二、社稷

(一) 以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在汉长安城南郊第1~12号建筑遗址以西, 勘探、发掘了第13、14号建筑遗址 [27]。

第13号建筑遗址的主体是一座东西向长方形的夯土台基, 台基中部正北直对未央宫前殿。夯土台基东西残长240、南北宽60~70米。其布局是主体建筑居中, 周施廊庑, 另有8座房间为附属建筑。夯土台基始建于秦代, 建筑

为西汉早期重建, 并沿用至西汉晚期。第14号建筑遗址有两重围墙, 平面呈“回”字形, 外围墙东西长600、南北宽570米, 内围墙边长273米。内、外围墙四面中央各开一门。围墙内未发现任何建筑遗存, 可能是因为主体建筑为土坛, 历久而毁不存。黄展岳认为第13号建筑遗址是汉社稷, 官社、官稷应与社稷在一处; 第14号建筑遗址可能是新莽的社稷, 其位置在汉社稷以南, 包括已遭废弃的汉社稷 [28]。刘瑞认为第14号建筑遗址为官稷, 官社与官稷应南北并列于同一个内围墙中, 而第13号建筑遗址属于宫殿建筑 [29]。姜波认为第13、14号建筑遗址分别为秦社稷坛和汉社稷坛 [30]。

笔者认为, 第13号建筑遗址属于秦汉时期的大型建筑, 其主体部分有可能是坛类建筑, 坛顶雨水通过竖井和排水管道排向建筑的北部区域, 所以不排除是社稷的可能性。主体建筑以北H2内出土1件陶盆底残片, 上有隶体“共器”戳印, 说明此盆应是祭祀用器, 为此建筑的祭祀类性质添一旁证。《汉书·郊祀志上》: “又置寿宫北宫, 张羽旗, 设共具, 以礼神君。” [31] 颜师古注曰: “共, 读曰供。” [32] 此外, 在主体建筑台基以北的东西两侧埋设有竖陶管, 其中东侧区域存有南北两排共6个, 每排3个, 东西间距约0.4米, 两排陶管错位分布; 西侧区域存有陶管1个, 与东侧区域南排3个处在一条直线上, 另外, 在此陶管的東西两边还发现多个埋置陶管的小方坑。陶管长66厘米, 大头外径21.5、内径17厘米, 小头外径20.5、内径16.5厘米。其大部被埋入地下, 仅有上部15~20厘米露出地面。在建筑附近埋设陶管的做法还见于汉长安城东北郊的阎新村秦汉建筑遗址, 刘致平认为其用途可能是安插挂灯的杆子, 用于照明 [33]。但结合上引文献, 这些竖管也可能是用来插立羽旗的。据考, 阎新村建筑遗址有可能是文帝所立的五帝坛, 同样属于祭祀类建筑 [34]。《汉书·郊祀志上》: “其秋, 为伐南越, 告祷泰一, 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 以象太一三星, 为泰一锋, 命曰‘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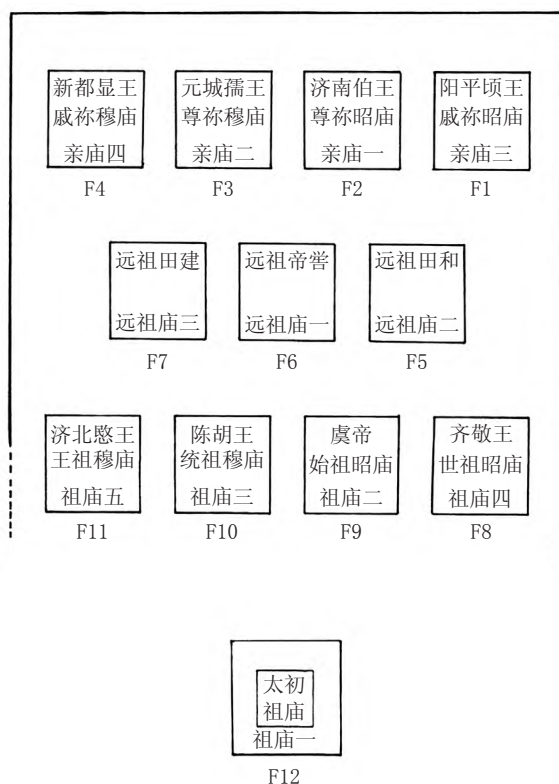
旗’ ”^[35]，看来用旗帜营造氛围，是当时祭祀常用的做法。

根据发掘报告，第14号建筑遗址外围墙北门西侧部分散水的做法与第1~12号建筑遗址相同，础石材质虽然与第13号建筑遗址同为天然片麻岩，但加工方法与成品形制却与第1~12号建筑遗址相同（推测是利用第13号建筑遗址的旧物加工而成），加之出土有玄武纹瓦当，所以判断其时代应与第1~12号建筑遗址相同。第14号建筑遗址内围墙南门遗址保存较好，其所用础石大多为未加工或顶面略琢平整的天然片麻岩，但门道两侧的4块础石是在天然片麻岩的顶面中间琢出圆槽（推测也是利用第13号建筑遗址的旧物改制而成），且出土有朱雀纹瓦当，其时代也应与第1~12号建筑遗址相同。既然第14号建筑遗址的两重围墙都是新莽时期建成的，规模又十分宏大，符合王莽在长安城南郊营建一系列礼制建筑的总体风格，所以黄展岳将其推定为新莽社稷是有说服力的。

（二）新的考古发现与认识

2012年，在第14号建筑遗址范围内勘探新发现两处建筑遗址。一处是在第14号建筑遗址西部、内外围墙之间偏南处，由四面夯土墙围成一个闭合空间，平面呈“口”字形，东西长约59、南北宽约54.8、墙基宽3.3~3.5米，四面墙上的门道情况不明，墙内未发现建筑遗存。另一处是在第14号建筑遗址西部、内外围墙之间偏北处，由2条夯土墙相交成“L”形，其中东墙经勘探南北长约27.7、墙基宽约3.7米，南墙经勘探东西长约58、墙基宽约4.5米。推测东墙北行后西折，南墙西端向北折行，则可围成一个平面呈“口”字形的空间。同样，墙上的门道情况不明，墙内不见相关建筑遗存^[36]（图六）。

新发现的两处建筑遗址等距离分居第14号建筑遗址外围墙西门内的南北两侧，且南北方位大致对应，距外围墙南、北墙的距离也基本相同，说明两处建筑遗址的布局及其与第14号建筑遗址的位置关系经过统一规划，它们之间当有内在的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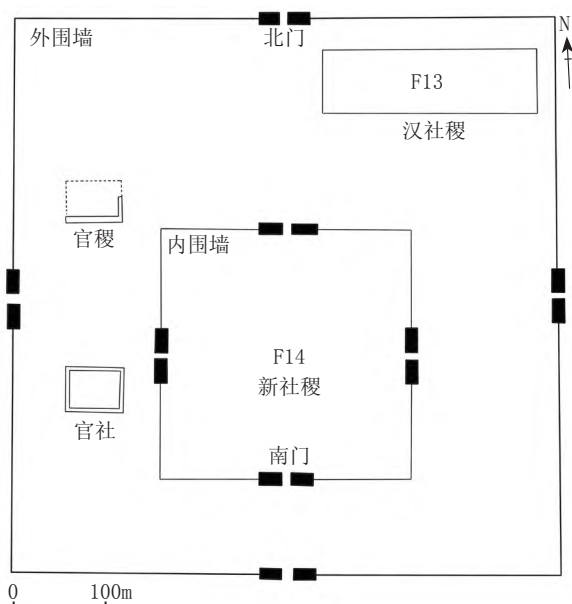


图五 黄展岳复原“王莽九庙”庙号位序

梳理相关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有三次社稷建设。最初是在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立社稷，即太社稷（太社、太稷），后来又立官社，到西汉末平帝元始三年（3年）才由王莽主持立官稷。如前所述，黄展岳将第13号建筑遗址推定为汉初所立社稷，此建筑的主体部分呈东西向长方形，若太社与太稷分立，可东西并列居其上。但从汉初至汉末分三次营建二社二稷、官社与官稷又是前后分立的情形看，它们不可能聚合在同一座夯土台上。第14号建筑遗址西部、内外围墙之间新发现的两处建筑遗址，为探寻西汉社稷的整体样貌提供了新思路。

西汉（太）社稷、官社、官稷应分居三处。第13号建筑遗址规模较大，被推定为（太）社稷，新发现的两处建筑遗址有可能分属官社与官稷。官稷位于官社之后，则南侧的建筑应为官社，北侧的建筑为官稷。

王莽代汉立新，都城及宫室百官虽辄改新名，但大多沿袭不变，因此，新社稷与汉社稷应在一处，同时很可能继承汉的（太）社稷、



图六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F13、F14平面布局示意图

官社、官稷制度。第14号建筑遗址既为新社稷（太社、太稷），汉官稷又是王莽所立——可能即是为了代汉而立，所以存在继承汉官社、官稷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王莽在立新（太）社稷时，有意保留汉的官社、官稷。这可能正是第14号建筑遗址拥有两重围墙的原因所在，因为若只用中心的建筑（太社稷），一周（内）围墙即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建筑单元。之所以设置外围墙，正是为了将这两组建筑包围进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稷体系，即二社二稷。第13号建筑遗址也被纳入外围墙之中，说明新莽时仍要对之加以利用，这应是造成内围墙偏于南部及内围墙东、西门道与外围墙东、西门道不相对应的原因。

新发现的两处建筑遗址只存有一周（或两面）夯土围墙，与第14号建筑遗址的形制相似，说明它们确属性质相同的建筑。围墙上应设门道，但没有发现，也可能已被破坏；围墙内应有坛类设施，或因基础不深而毁灭无存。

两处建筑遗址只做了勘探，其时代无法准确判断。虽然不能排除它们与第14号建筑遗址同时修建的可能性，但从它们与内围墙西墙（不对称）、南侧建筑与内围墙西门（靠得较近）的位置关系来看，不像是经过统一规划而新建的。

三、几点认识

（一）汉承秦制

秦都咸阳是在渭水以北，在北对咸阳的渭水以南，即文献所称的“渭南”，分布有宗庙和社稷。宗庙应有多座，见于史籍者有昭王庙和始皇帝庙。可以说“渭南”即是咸阳城隔河相望的南郊^[37]。西汉在长安城南郊立社稷，新莽在常安城南郊建宗庙、社稷，也可看作是汉承秦制的一种表现。

（二）左祖右社

“左祖右社”是《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建国都的一项制度。从文献记载看，西汉太上皇庙、高帝庙在长安城中，太上皇庙可能在长乐宫以北，高帝庙可能在未央宫东南的安门大街西侧。文帝庙应在长安城东郊。自景帝开始将庙设于陵墓附近，不再在长安城内外建庙。西汉末年王莽主政时是否曾在南郊为汉帝营建宗庙，还存在不同意见。《汉书·王莽传中》：“莽又曰：‘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38]此时王莽虽然尚未代汉立新，但其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代汉做准备，也就是为未来的“新朝”做规划，所以“祧庙”实际上就是“新朝”之庙。因为汉已有社稷，这里的“社稷”也应是“新朝”之社稷。可以说西汉在长安城南郊是能够将宗庙和社稷规划、建设成“左祖右社”的布局，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因此西汉一代并未形成“左祖右社”的城市格局。

王莽代汉前即开始在长安城南郊规划和营建“新朝”的宗庙、社稷，并最终建成，即第1~12号建筑遗址的“王莽九庙”和第14号建筑遗址的新社稷，从而在新朝常安城（汉长安城）南郊、出皇宫寿成室（汉未央宫）南门与城墙信平门（汉西安门）南行道路的东西两侧，形成较为规整的“左祖右社”格局，特别表现在“王莽九庙”中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第12号建筑遗址（黄帝太初祖庙）与第14号建筑遗址整体上是东西对应的。

(三) 从长安到洛阳

东汉在继承新莽祭祀制度的同时,也有所改变。从宗庙、社稷的位置看,在长安是设于南郊、北对皇宫的位置,在洛阳则置于城内的宫城之南。《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二年)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39],注引《续汉书》曰:“立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皆方坛,四面及中各依方色,无屋,有墙门而已。”^[40]《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夏,安汉公奏车服制度,吏民养生、送终、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学官”^[41],注引臣瓚曰:“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不立官稷。至此始立官稷。光武之后,但有官社,不立官稷。”^[42]若此说可信,则东汉除了(太)社稷外,还立有官社。

附记:张建锋先生帮助制作本文插图,在此谨致谢忱!

- [1]陈直.三辅黄图校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116.
- [2]班固.汉书·申屠嘉传(第4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02.“(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
- [3]班固.汉书·韦贤传(第7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115.“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
- [4]班固.汉书·叔孙通传(第4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29-2130.
- [5]同[4]:2130.
- [6]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J].考古,1996(10).
- [7]同[1]:117.
- [8]宋敏求,李好文.长安志·长安志图[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92.
- [9]同[1]:118.

- [10]刘庆柱.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98-99.
- [11]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刍议[J].考古与文物,1999(6).
- [12]同[3]:3110.
- [13]班固.汉书·文帝纪(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1.
- [14]同[8]:194.
- [15]刘振东,谭青枝.顾成庙与奉明园[J].考古与文物,2019(5).
- [1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3(4).
- [17]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下(第19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771.
- [18]陈爱东.西安三殿汉代古桥遗址相关问题研究[J].考古与文物,2023(4).
- [19]汉阳陵博物院.汉阳陵博物院[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56.
-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19,图7-7.
- [21]同[15].
- [22]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第8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327.
-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5-21,图一,图八.
- [24]班固.汉书·王莽传下(第99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4162.
- [25]同[23]:222,图一七〇.
- [26]同[23]:221.
- [27]同[23].
- [28]同[23]:224-225.
- [29]刘瑞.汉长安城的朝向、轴线与南郊礼制建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46-247.
- [30]姜波.郊坛、明堂与宗庙——西汉长安城的祭祀设施[C]//汉长安城考古与汉文化——纪念汉长安城考古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70.
- [31]班固.汉书·郊祀志上(第25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20.
- [32]同[31]:1221.
- [33]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J].文物参考资料,1957(3).
- [34]刘振东.简论汉长安城之郊[J].考古与文物,2016(5).
- [35]同[31]:1231.
- [36]资料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 [37]刘振东.秦都咸阳之“渭南”[C]//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21.
- [38]班固.汉书·王莽传中(第99卷中)[M].北京:中华书局,1962:4106.
- [39]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第1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27.
- [40]同[39]:27.
- [41]班固.汉书·平帝纪(第1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5.
- [42]同[41]:355.

(责任编辑 张雅雅)